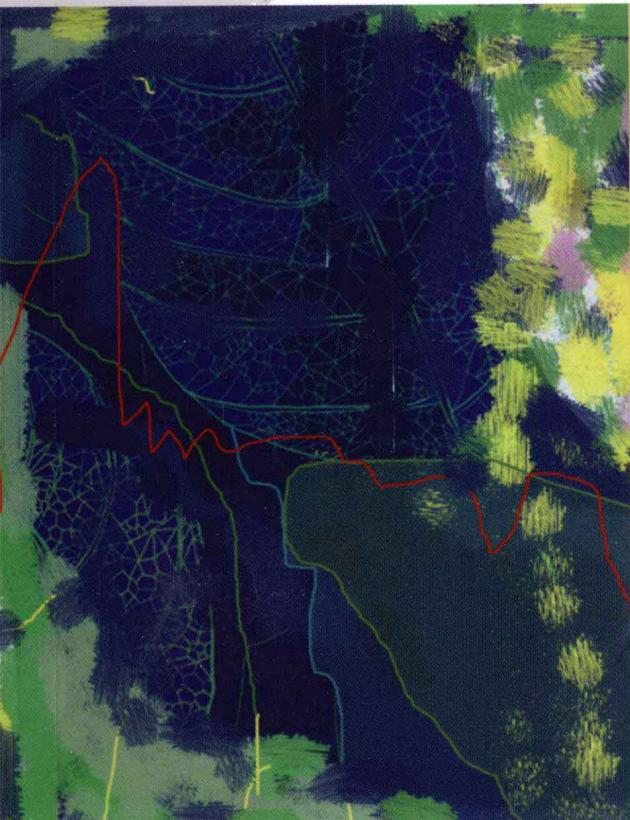


# 符号与传媒 5

2012年秋季号

Signs  
& Media  
(总第 5 辑)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主办



四川大学出版社

# Signs & Media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主办

# 符号与传媒

5

2012年秋季号  
(总第**5**辑)



四川大学出版社

特约编辑:胡雯婷  
责任编辑:吴雨时  
责任校对:黄蕴婷  
封面设计:原谋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符号与传媒. 第 5 辑 / 曹顺庆, 赵毅衡主编. —成  
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614-6155-6  
I. ①符… II. ①曹… ②赵… III. ①符号学—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7384 号

### 书名 符号与传媒(第五辑)

---

主 编	曹顺庆 赵毅衡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 网址: <a href="http://www.scup.cn">http://www.scup.cn</a>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6155-6	
印 刷	四川和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6	
字 数	29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 学术委员（以拼音为序）：

- |              |              |
|--------------|--------------|
| 丁尔苏（香港岭南大学）  |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  |
| 龚鹏程（台湾佛光大学）  | 徐亮（浙江大学）     |
| 傅修延（江西师范大学）  | 杨慧琳（中国人民大学）  |
| 蒋述卓（暨南大学）    | 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 |
| 李彬（清华大学）     | 乐黛云（北京大学）    |
| 李凤亮（深圳大学）    | 张杰（南京师范大学）   |
| 李杰（浙江大学）     | 张智庭（南开大学）    |
| 乔国强（上海外国语大学） | 赵宪章（南京大学）    |
| 申丹（北京大学）     | 周宪（南京大学）     |
| 陶东风（中国人民大学）  | 朱成（西南交通大学）   |
| 王宁（清华大学）     | 朱国华（华东师范大学）  |

### 《符号与传媒》编委会

主编：曹顺庆

执行主编：赵毅衡

执行编辑：董明来 李璐茜

网络总监：饶广祥

## 编者的话

关于符号学与传媒学本身的意义，我们并不应该多加饶舌：正如一出戏剧的优美，不必由剧院的地板工来提醒观众。如果说我们有什么，或者将要有什么可以自夸之处，那或许就是，通过我们卑微的劳作，观众们已经，或者将要对上演的剧目感到熟悉、亲切，甚至狂热。

当然，无论如何，钻研符号学与传播学的学者们，显然已经沉溺其中，不可自拔。想要总结这些学者们成果的尝试，即使并非傲慢，也几乎总会归于徒劳：在这期的“理论与运用”中，几乎每一位学者，都在致力于开拓一个独立论域的纵深：无论是对俄苏深厚的符号学传统的总结、通过“造词”理论对传统词汇学的符号学革新、对传统单向传播模式的质疑，还是在现象学视域对符号真值问题的解决尝试，都已然是既有学科内崭新的尝试，而对iPhone热、网络小说和谜题电影的学理诘问，则更是符号学—传媒学研究对纷涌世事最敏锐的感触、最勇敢的回答。

事实上，即使是那些被笼统地归于“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专辑下的探索，也绝非千人一面的重复。恰恰相反，在传统极尽灿烂之能事的思想光谱之中，几乎每一位符号学学者，都能找到一块尚未经过开垦的肥沃土地：谁敢说，在符号修辞学视域下的禅诗研究、对术数的结构主义研究、对《文心雕龙》整体符号特质的描绘、对意象的空间符号学分析，以及通过符号学对易学思想的祛魅，就穷尽了传统思想与符号学接触的所有可能呢？从而，本专辑中所收录的五篇文章，不过是诸多可能中的几个例子，虽然这些例子本身，也已足够精彩——符号学研究者之于传统思想，不过如庄生所谓“群鼠饮河”耳。

来自远方的学术声音，同样也并非单向度的传输。在任何时候，学术都



和所有主体间性的关系一样，乃是双向的对话——事实上，它或许是人类生活中最依赖于对话的领域之一。而在本期《符号与传媒》之中，除了一如既往地在“理论辨义互动：翻译与回应”板块中对国外符号学—传媒学思想的应对，以及在“近著近译书评”环节中对国内学界最新成果的致敬之外，我们还幸运地得到了与海峡对岸同行们进行交流的机会：继上一期来自台湾朝阳科技大学的邱顺应先生的理论探索之后，来自台湾大学的蔡秀枝教授，也以最直接的访谈—对话的形式，在我们的平台上发出了声音。

一直以来，哺育《符号与传媒》的，都是来自不同学者们的同样的热情——我们知道，对这种哺育的依赖，永无断奶的可能。我们期望的只有一点，那就是：通过我们些微的成长，让更多学者看到，在符号学—传媒学中注入的热情，绝非无用的投资，对这两门学问的探索，将有极大的机会获得应得的成果。

# 目 录

## CONTENTS

### 理论与运用

- 003 “聚和性”意识中的俄苏符号学 / 张 杰
- 007 从造词到类文字 / 孟 华
- 020 在现象学视域内对符号真值的分析  
——与赵毅衡老师商榷 / 董明来
- 035 从“信号传输”到“意义分享”  
——论传播理论模型中的符号观 / 胡易容
- 048 网络文学符号学：尚待开拓的新领域 / 王小英
- 057 时尚消费哲学初探  
——以“iPhone热”为例 / 毛 琦
- 066 谜题电影情节结构的“多重性” / 林 咏

### 中国台湾符号学者访谈

- 077 符号学与空间理论的遇合：蔡秀枝教授访谈  
/ 蔡秀枝 彭 佳

### 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专辑

- 089 编者按
- 090 诗之“禅味”与“反讽”  
——从禅的“平常语”与诗的“陌生化”之悖离说起  
/ 孙金燕
- 100 《文心雕龙》符号学研究  
——传统释义话语的叙事与结构符号初探 / 张劲松

## □ 符号与传媒

- 107 从天地到人伦  
——四柱禄命中的符号及其理据性上升 / 兰 兴
- 115 拟诸形容，象其物宜  
——易学符号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 祝 东
- 124 “意境”理论的符号学原理 / 谭光辉
- 130 唯识学中的名言与真实 / 续戒法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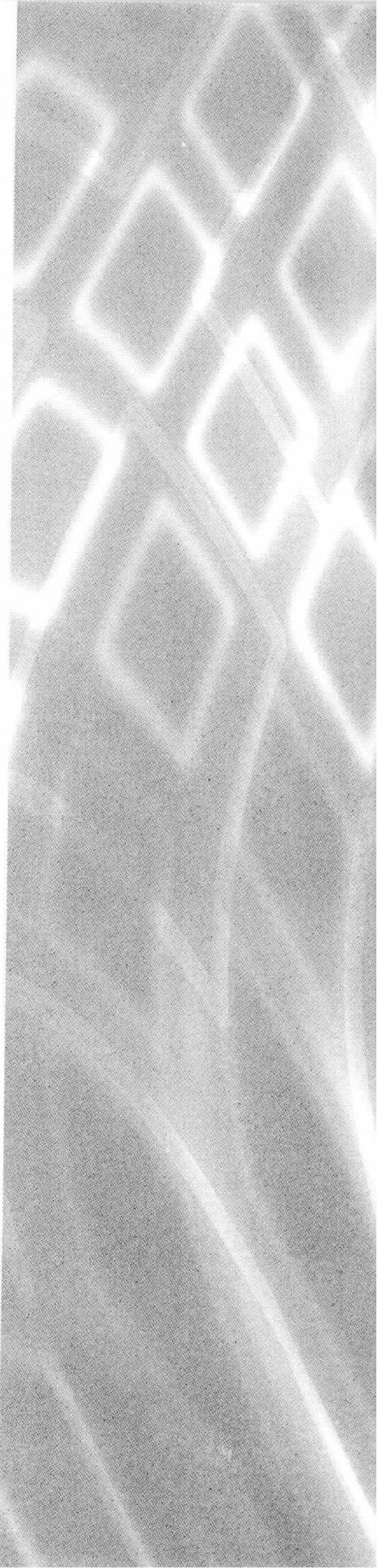
### 理论辨义互动：翻译与回应

- 145 论威利对象征互动主义理论的贡献  
/ [美国] R·柯林斯著 文一茗译
- 156 表演符号学的思路  
——回应塔拉斯蒂的《“表演符号学”：一种建议》 / 陆正兰
- 160 表演艺术符号学：一个建议  
/ [芬兰] 埃罗·塔拉斯蒂著 段练 陆正兰译
- 176 苏珊·佩特丽莉及其开辟和倡导的伦理符号学 / 周劲松
- 181 伦理符号学 / [意大利] 苏珊·佩特丽莉  
奥古斯都·庞奇奥著 周劲松译
- 195 性别/性符号：意识形态性·多元文化主义·非本体论  
——简评达丽娅·杰西卡《性别/性符号学》 / 程丽蓉
- 199 性别符号学 / [加拿大] 达丽娅·杰西卡著 程丽蓉译
- 219 品牌名称的另一种理据  
——符用理据性 / 蒋诗萍
- 222 品牌符号学 / [加拿大] 马赛尔·达内西著 蒋诗萍译

### 近著近译书评

- 229 符号跨界：音乐研究的新范式  
——评佩吉莱编《音乐·符号·传媒——  
音乐符号学论文集》 / 刘小波
- 236 似是而非 似黑而白  
——评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雅克·拉康》 / 张 颖
- 239 假想世界中毒症候群  
——评日本限界小说研究会编著《社会不存在  
——世界系文化论》 / 李璐茜
- 242 生活的表演，表演的生活  
——评达内西《香烟、高跟鞋及其他有趣的东西：符号学导论》  
/ 宋 颖
- 245 评姜可立《文学语言符号学》 / 汪士廉

# 理论与应用





# “聚和性” 意识中的俄苏符号学

张 杰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简要地梳理由俄苏符号学诸大家所构成的思想图谱，说明俄罗斯符号学学派与传统东正教宗教“聚和性”思想之间的纽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强调“多元”与“对话”的思想特征。

**关键词：**俄苏符号学、塔尔图学派、聚和性、对话、多元

翻开世界符号学研究的历史地图，在原苏联的版图上，符号学大师云集，硕果累累。米·巴赫金（М. Бахтин）、尤·洛特曼（Ю. Лотман）、鲍·乌斯宾斯基（Б. Успенский）等均是堪称世界级的理论家、思想家，还有毕生致力于符号学研究的一大批理论家，如塔尔图学派的明茨（З. Минц），托普洛夫（В. Топров），叶戈洛夫（Б. Егоров），切尔诺夫（И. Чернов），比亚季戈尔斯基（А. Пятигорский），洛特曼（М. Лотман）等，莫斯科学派的伊凡诺夫（Вяч. Вс. Иванов），列夫金（И. Ревзин），列文（Ю. Левин）等。也许除了现任国际符号学学会会长塔拉斯基领导的赫尔辛基大学设在小镇伊玛特拉的符号学研究基地，很难找到像塔尔图大学那样的专门研究符号学的机构和组织。

其实，某一个学派或区域的研究水平自然不应取决于理论家和研究成果的数量，而应是表现在能够反映研究水平的特色上。然而，俄苏符号学的研究特色很难归纳和总结，也许“多元”和“对话”就是该学派研究的主要特色。记得2008年在休斯敦举行的美国符号学年会上，一位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学者就直接说道：“符号学研究就是为了让世界变得多元。”俄苏的符号学家们或许就是本着这一原则在从事着自己热爱的事业。

沿着俄苏符号学研究的轨迹，如果从196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题为“符号



“系统的结构研究”学术研讨会算起，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已经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历程。如若从巴赫金的符号学思想来看，俄苏符号学发展的历史则更早，甚至可以推进到 20 世纪 20 年代。可以说，1991 年苏联解体之前的二三十年，是俄苏符号学发展的主要时期，几乎所有的俄苏符号学大师也都主要活动在这一时期。巴赫金和洛特曼先后逝世于 1975 年和 1992 年，他们均是苏联时期的符号学家。只有出生于 1937 年的莫斯科大学教授乌斯宾斯基，至今还在符号学的领域耕耘着，但是他的主要学术思想在苏联时期也已经形成。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一个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苏联时期，能够诞生出以“多元”和“对话”为特征的符号学派呢？1953 年斯大林的去世，虽然为苏联迎来了学术“解冻”的春天，使得俄国形式主义的继承者们得以用符号学的研究延续该学派的精神，但是俄苏符号学的学术精神却不可能是源于“解冻”，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思想和文化根源。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巴赫金的学术思想是如此，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也是如此。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信奉东正教的民族，几乎在这个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主要领域都渗透着东正教的文化精神，也正是这一文化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的哲学、文学、艺术等，无疑也直接影响了符号学。俄罗斯斯拉夫派领袖霍米雅科夫在概括东正教会的本质时，曾经提出一个神学概念“聚和性”(*соборность*)，以表明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新教会之间的根本不同。该词的词根是“聚会”的意思，“‘聚’是指依靠着信仰为了一个焦点而结合的意思，‘和’是‘和而不同’的‘和’，这就是‘聚和性’的含义”。这里一共有两个关键字：“聚”与“和”。“聚”是在统一的信仰下，也就是对上帝的信仰下，众多信徒自觉自愿地走到一起，而这种聚集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这里突出的是东正教会的精神性。“和”就是显示东正教会的有机性，每一个个性的自由和独立性，而不是简单的服从和统一。“聚和性”反映了俄罗斯民族东正教信仰的实质，即由内向外的和谐的精神有机体。因此，在俄苏符号学界，不同的理论家均是一个个思想独立的“和”的个体，保持着自己的学术观点，同时又能够非常自愿地，发自内心地与别的理论家“聚”在一起，和睦相处。他们在同一个“信仰”，即共同的学术理想和追求下，相互包容，相互对话，相互促进。

东正教“聚和性”的作用并非是把各种人物和观点简单地聚集起来，而是一种“意识”的“聚和”。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家特鲁别茨科

伊在《论人类意识的本质》中，深入阐释了“聚和性”意识。他认为，“聚和性”意识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个性意识，也不只是集体意识，而是个人意识、集体意识与普遍意识的“三位一体”。在理想的人类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内在地拥有“聚和性”意识，这一意识的主要特征就是爱，爱是连接理想社会中个人关系的纽带。在原苏联学术界，这种爱就是对真理的爱，是可以排除外界干扰的学术追求以及对自己国家的爱。

原苏联的理论家们，有的政治观点迥异，但学术观点相近；也有的学术观点不一，却政治立场一致；更有的虽然继承着本学派的学术精神，却能够对前辈的学术观点持批判态度。不少学者在学术上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甚至针锋相对，但是平时依然是好朋友，和睦相处。巴赫金遗产的继承人巴恰洛夫和科日诺夫，两位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在政治观点上分歧很大，前者拥护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化，而后者则倾向于俄罗斯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两人有时还在电视上争得面红耳赤，但是在研究巴赫金的学术理论和思想上，他们是非常一致的，共同研究和推广巴赫金的学术思想。

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领袖洛特曼在学术精神上，继承着俄国形式主义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的传统，但是他非常尊重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者巴赫金，并且积极地从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中汲取营养，把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引向深入。莫斯科大学的乌斯宾斯基教授主要是沿着俄国形式主义莫斯科语言小组的轨迹前进的，可是他在洛特曼文艺学研究的影响下，甚至先于洛特曼撰写了专著《结构诗学：艺术文本的结构和结构形式类型学》（1970）。后来在相互的积极影响下，两位伟大的学者都走向了文化符号学。

巴赫金虽说在理论上主张“对话”，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个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的学者，很少与同时代学者或他的同事们“对话”。他的特点是擅长与前人的学术思想“对话”，尤其是挑战权威的学术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巴赫金与他的伙伴们组成的第一个学术团体就是“康德研讨小组”，然而他在20年代写下的《走向行动哲学》一文中，以康德作为抨击对象，指出抽象思辨的“理念主义”致使现代人“行动的贫困化”。1924年，他来到形式主义学者活动的中心——列宁格勒著名的艺术史研究所，但不久却写出了批判俄国形式主义的学术专著《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1927）。当文艺学界突显悲剧的意义时，他却张扬喜剧的作用，强调“笑”的功能，主张通过“狂欢化”达到“去中心化”的目的。

塔尔图大学的美学家斯托罗维奇（Л. Н. Столович）教授，于2005年

在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哲学史》一书中，就区分了俄罗斯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研究特征。他明确指出，西方哲学主要探讨的是知识理论、认识论；而俄罗斯哲学则更主要关注艺术审美问题以及宗教、伦理和社会政治等问题。在斯托罗维奇看来，俄罗斯哲学的研究与文学艺术、宗教活动的美学探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从古罗斯宗教艺术活动的源头追溯俄罗斯哲学思想的产生，努力揭示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与宗教文化和艺术之间的联系。

回眸 20 世纪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在 20 世纪两端的世纪之交，都是俄罗斯宗教文化十分活跃的时期。如果说与 19 世纪之交，涌现了像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洛连斯基等一大批宗教文化理论家，那么与 21 世纪之交则是宗教文化的回归和复兴。俄罗斯著名作家托尔斯泰曾经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借用《福音书》中的话说：一个世纪的终结并非是一个百年的结束和开始，而是意味着一种世界观、一种信念、一种人们交际方法的出现。

显而易见，俄罗斯宗教文化的兴起或复苏，催生和推动着俄罗斯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学科的诞生与发展。俄苏符号学界世界级大师辈出、理论家云集、研究成果丰硕，均是与俄罗斯民族信奉的东正教息息相关的，尤其是与“聚和性”意识联系密切。可以说，“聚和性”意识深刻地影响着俄苏符号学的研究，俄苏符号学又推进着俄罗斯社会的“多元”和“对话”。

**作者简介：**

张杰，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院长。

E-mail：z-jie1016@hotmail.com

# 从造词到类文字

孟 华

**摘 要：**本文旨在研究类文字的符号学本质。类文字作为一种符号，其特征乃是与文字之间的特殊关联；对此类现象的研究，乃是基于造词理论的汉字符号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而后者在使用了由索绪尔开发出来的符号学原理的同时，也试图扬弃其过于结构主义的僵死要素。

**关键词：**词汇学、造词、汉字符号学、类文字

## 一、关于造词

说起造词，当然就要从我师从葛本仪先生说起。

我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后来将自己写不出像样东西的原因，归结于个人的“词汇贫乏”。这个“误判”却致使自己走向词汇学。我在工厂做工人时便开始搜集各种语汇，建立自己的词典，并在《汉语学习》、《辞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学术文章。那时学术界对词汇的理解，主要还是受斯大林的“建筑材料”和结构主义的“结构单位”等观点的支配，把词语看做是静态的语言备用单位，研究者主要的工作就是确定各种边界：词与非词的分辨，词的内部意义结构划分，词汇与语法的区别，词的各种形式或功能参数的定量分析……

这种观点与我对词汇的实际感受相差太远，当时无法把这种感受总结出来，但用今天的学术语言分析，我当时心目中的词语还应该是一种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它是人类语言生活的全息胚，它不仅有着自己的内部结构规定性，同时还关联了语法、修辞、书写，关联了整个人类的交流活动。总之，它还具有跨界的、动态的、异质的、开放的、人文的等另一些属性，词语就

是一个文化世界。

1987年，我带着这种懵懂的感受入葛本仪先生门下后，思路很快就被她的“造词理论”激活了。当时词汇学界的主流是“构词说”，鲜有学者在研究构词的同时还考虑造词问题。构词与造词，一字之差，理路迥异。“构词”是后得于词，即人们从一个既有的词语成品出发，静态地分析它的结构规则及其类型，诸如偏正式、主谓式、联合式、补充式等等。而“造词”是先得于词，即重点思考一个词“从无到有”的问题（葛本仪语），先是“造词”的活动而后才有活动的产品——“词”。

造词说蕴涵着一个语言学研究方法论的根本分野：从语言静态的结构分析转向动态的、开放的言语活动的研究，转向静态结构与动态功能、人与语言的相关性研究。

当然，造词的研究又可以从两个具体路径入手：一是面向词汇系统，通过语言的现成结构单位，概括出它们被生产的那些机制和规则。葛老师就是走的这个路子，譬如她通过对现成的汉语词语的结构分析，概括出音变法、摹声法、音义任意结合法、说明法、比拟法、引申法、简缩法等。显然，这种研究已经超出了传统语法学构词法的纯结构描写，引入了动态的修辞、语用等要素和规则。这些观点在80年代的词汇学界还是相当另类的，当时的词汇学家们很少有人关注造词问题。正是在葛先生的启发下，我走向了造词研究的第二个路径，即直接面对人们的言语活动，去观察一个词如何从言语活动片段演变为语言结构单位（词）。这个过程就是“命名”。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就是《命名简论》（1990年），现在看来这应该是学术界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命名学的论文，分两期发表于《青岛师范专科学报》。后来我又连续发表了几篇关于命名的文章，遗憾的是我所憧憬的命名学还没有建立，兴趣便匆匆转移了。

正是有了师从葛老师进行造词（命名）研究的经历，我此后的学术研究始终关注的是语言的异质性质，即任何一个语言单位，譬如说词，它总是在与人、与社会、与语境、与语言结构自身、与其他异质符号（书写、图像、标记、实物等）的关联中定义自身的。这个学术立场成为我始终不渝的基本原则，它显然受惠于葛老师的造词说。后来我发现，实现这个学术理想最好的领域是符号学。而词汇学与符号学有着天然的联系。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索绪尔的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提出了符号学的一些基本范畴，诸如能指和所指、任意性和相对可论证性、语言和言语、组合和聚合、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语言和文字，等等。我们会发现，他的符号学或语言学的